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二辑】

翁同爵家书系年考

翁同爵 著 李红英 辑考

■ 凤凰出版社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二辑】

“十二五”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翁同爵家书系年考

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

翁同爵 著

李红英 编考
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翁同爵家书系年考 / 翁同爵著 ; 李红英辑考.
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5.5
(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. 第2辑)
ISBN 978-7-5506-2126-8

I. ①翁… II. ①翁… ②李… III. ①翁同爵 (1814~1877年) —书信集 IV. ①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50832号

书 名 翁同爵家书系年考
著 者 翁同爵 著 李红英 编辑
责 任 编 辑 陆 扬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发行部电话 025-83223462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fhcbs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 9 号, 邮编: 225008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7.5
字 数 455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06-2126-8
定 价 70.00 元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 0514-85868858)

存史謐今

袁行霈題



袁行霈先生題辭

音实难知，知实难逢，逢其
知音，千载其一乎！人之内心往往
知音之一今读新编诗见史科
判，真有临于知音之感。
丁巳年夏月

傅璇琮书

二〇一二年

傅璇琮先生题辞

殚精竭慮旁搜遠绍
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
料庫

王水照
二〇一三年一月

王水照先生题辞

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》总序

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，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“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”（罗素《中国问题》）。她绵延不绝、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？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：“和平、和谐、包容、开明、革新、开放，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。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，文明就繁荣发展，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，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。”（《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1期）

但我也要清醒看到，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，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，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，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。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，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；更不用说遭逢“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”、“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”（李鸿章《筹议海防折》），“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”（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序》）的中国近现代。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，但是，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，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。1998年6月17日，美国三位前总统（布什、卡特、福特）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、前财政部长、前国防部长、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：“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。”（徐中约著《中国近代史》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，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）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，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，相反，

2 翁同爵家书系年考

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。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,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层面,人们还在不断探索。这个问题,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。但我们坚信,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,涅槃重生。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,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。

不过,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,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。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,内容复杂,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,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,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。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:“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,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。”那么,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,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——这是我们编纂这套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》的初衷。

书名中的“近现代”,主要指 1840—1949 年这一时段,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,可以适当向前延展,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“近代中国”、“晚期中华帝国”又有所区分。将近现代连为一体,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,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,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,风从何处来;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,或为涟漪,或为浪涛。个人的生活记录,与大历史相比,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。变局中的个体,经历的可能是渐变。《丛刊》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,以个体陈述的方式,从生活、文化、风习、人情等多个层面,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。

书名中的“稀见”,只是相对而言。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,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,真身虽仍“稀见”,化身却成为“可见”。但是,高昂的定价、难辨的字迹、未经标点的文

本,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。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,或流传较少,或未被整合,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。因此,《丛刊》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,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、断句费力、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,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,在我们看来,这些文献都可属于“稀见”。

书名中的“史料”,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,举凡日记、书信、奏牍、笔记、诗文集、诗话、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,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、思想、性情的文献,都在考虑之列。我们的目的,是想以切实的工作,促进处于秘藏、边缘、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,通过一辑、二辑、三辑……这样的累积性整理,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,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,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,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,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、日常与细节;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,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;甚至在主流中,还有漩涡,在边缘,还有静止之水。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、大痛苦的时代,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、所思所想的起落,藉纸墨得以留存,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。此中有文学、文化、生活;也时有动乱、战争、革命。我们整理史料,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,或者一种贴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。当然,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,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,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,减少因个人视角、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。

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,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。清人舒位诗云“名士十年无赖贼”(《金谷园故址》),我们警惕袖手空谈,傲慢指点江山;鲁迅先生诗云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(《自题小像》),我们愿意埋头苦干,逐步趋近理想。我们没有奢望这套《丛刊》产生宏大的效果,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,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,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,适当“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”

4 翁同爵家书系年考

(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版序言)。

《丛刊》的编纂,得到了诸多前辈、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。袁行霈先生、傅璇琮先生、王水照先生题辞勉励,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,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,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“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”重大规划项目,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……这些,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《丛刊》的信心。必须一提的是,《丛刊》原拟主编四人(张剑、张晖、徐雁平、彭国忠),每位主编负责一辑,周而复始,滚动发展,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,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,令人抱恨终天,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。

《丛刊》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(鼓励必要的校释),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、更好地服务社会。希望我们的工作,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。

2013年4月15日

前 言

翁同爵(1814—1877)，字玉甫，翁心存次子，翁氏叔伯中排行第五，故翁同龢称其为五兄。道光三年九月，翁心存叔父翁颖封卒，因其子翁庆贻早亡，翁同爵过继给翁颖封为嗣孙^①。

咸丰元年五月，翁同爵考取荫生，取一等第二名，引见内用，以主事签分兵部，在武选司行走。是年秋，其父翁心存典顺天乡试，翁同爵回避不考试，即告假出都。咸丰二年八月，应顺天乡试不第，自是绝意制举业。

同治元年二月，翁同爵京察一等引见，记名以道府用。同治三年九月，翁同爵奉旨授湖南盐法长宝道^②。历任湖南盐运使、湖南按察使、湖南布政使、四川按察使、陕西布政使、陕西巡抚。同治十三年九月，翁同爵补授湖北巡抚，兼兵部侍郎、都察院右副都御使。光绪元年五月，翁同爵兼署湖广总督。光绪三年八月初一日病逝于湖北任上^③。

国家图书馆藏《常熟翁氏家书》七函二十四册，保存了翁氏兄弟、子侄之间的家书，总计约九百馀通。其中翁同书家书一百五十馀通，

① 《翁心存日记》第四册，中华书局，2011年6月，第1853页。

② 《翁同龢日记》第一卷，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，中西书局，2012年1月，第377页。

③ 关于翁同爵生平参见周文晓编著《翁同龢年谱·翁玉甫先生年谱》，古吴轩出版社，1994年10月，172—188页。

2 翁同爵家书系年考

包括致翁同龢家书十馀通；翁同爵家书三百馀通，其中致翁同龢家书七十馀通，其馀为致翁曾翰家书。翁同龢家书二百馀通，内有致翁同爵家书近十通，致翁斌孙家书近二百通，致翁曾翰、曾桂等子侄辈家书数通；另有翁同福、翁曾翰、翁曾荣等人家书近二百通。翁氏家书对研究翁同龢及其家族政治、社会活动，进而研究晚清政局、重大历史事件，具有很高史料价值。

家书，是写给父母、兄弟、子女等家人的书信。既然是写给家人，心有所思，笔有所述；字里行间，少了与外人说话行文的讳饰与应承，是主人公最直接的情感流露，亦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录。翁心存历官工部、刑部、兵部、吏部、户部尚书，直至入阁拜相，是道咸两朝重臣；翁同龢先后为同治、光绪两朝帝师，曾两度入值军机，历官刑部、工部、户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，其举手投足，对清末政治有一定影响。翁同爵亦是晚清重臣，惜一直以来关注者颇少。本书辑录国家图书馆藏《常熟翁氏家书》中的翁同爵家书，并加以系年考证，敬请方家批评指正。

一、尺牍方寸心，游子情殷殷。

《常熟翁氏家书》中所收的翁同爵家书，其内容不仅有父子兄弟间的家长里短、离情别绪等百姓生活，亦有朝章国故、地方军政等国家大事，是研究翁心存父子四人以及翁氏家族的第一手资料。家书笺纸之间多钤有骑缝印鉴，其中有人名印，如“玉父”、“玉甫手缄”、“玉甫”等朱文方印；亦有表明心志之印，如“清慎勤”朱文方印、“素位而行”朱文方印、“谨慎”朱文长方印等。主要是致其弟翁同龢与其子翁曾翰的家书，约有二百馀通，从中可见翁同爵为人子、为人父、为人兄的日常生活，为研究翁同爵及翁氏父子提供了更为丰富、真实、直接的资料。

1. 寸草春晖，孺慕之情切。

国家图书馆藏《常熟翁氏家书》中所收翁同爵致其父母家书并不

多，然每一通都饱含着翁同爵对其父母的孝心与关心。暑热酷寒，风霜雨雪，衣食住行，嘘寒问暖，不厌其烦。如道光三十年四月初四日家书云：

父亲大人近体复原，饮食如旧，深为庆慰，惟左足尚形软弱，亟宜调治为祷，董子远方药合宜可嘱其开一补方，以便常服。退直后虽有本部公事，回稿一切，然得暇即宜休息，勿太劳神，至祷，至祷。母亲大人精神虽□□□□□□调理补剂，暇时可略观大字闲书数页，以解烦闷，针黹生活只可偶一为之，切勿□□，以致伤目动火。

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书云：

父亲现任农部，正值度支匮乏之时、钱法弊坏之际，均节整饬，皆极劳神，幸祈公馀闲暇诸自节力，勿过焦思为祷。

同治三年十月三十日书云：

母亲饮食起居宜万分珍摄，三冬必须穿皮衣，切勿贪凉。

同治四年三月二十日书云：

天时渐暖，京寓凉棚必须支搭，切勿惜费。衣服一切祈随时珍摄为祷。

翁同爵离京外任，不在父母身边，不能承欢膝下，便在家书中经常嘱咐陪伴在父母身边的兄弟子侄，留心父母的衣食住行，代替自己向父母尽孝。如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致翁同龢家书云：

4 翁同爵家书系年考

母亲大人饮食起居须加意调护。今年天气较寒……房内炉火必须要，衣服亦须多穿，不可贪凉也。

翁同爵对父母的体贴细致入微，常常是落到实处，非常具体。如同治四年十月致翁曾翰家书云：

汝祖母处每日饭菜可令厨房预备一小暖锅，方不致冷。其锅中之菜，须每顿更换，不必拘定样数，即一二味可吃者，皆可装暖锅。但暖锅须口大而胆小，方便用匙勺，装时汤须略多，切勿照铺家之堆满锅面，汤少面菜干，便毫无意味。炭须烧红而多备，添锅汤亦须预先伺候。否则，炭或不红，汤或未备，反致老人饭时生气，则大不可。饭时倘汝叔及汝均不在旁，可令秀姑娘隅坐陪吃，方不寂寞。盖汝伯母既多病未愈，孙媳辈又有小儿缠绕，皆不能常在汝祖母房中照料，故不如即令秀姑娘陪吃，较为便当。

同治五年五月十四日致翁曾翰家书云：

京师则瓜果皆佳，自可常吃。惟汝祖母大人年高脾胃弱，须择好者方宜吃，且吃时不宜多，即瓜汁亦须少吃。

同治三年十月，翁同爵是举债离京，赴湖南盐法道任。此后曾先后三次任臬司一职，廉俸并不很多。其中，同治四年是翁同爵离京外任的第一年，不仅举债出京，又有半年署理按察使，令其“赔累不堪”^①。虽然如此，远在他乡的翁同爵，仍念念不忘筹寄京寓日用所

^① 参见同治五年正月十三日致翁曾翰家书。

需，虽“菲衣节食，而京寓菽水之资，却时刻在怀”^①，藉得菽水承欢。如同治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致翁同龢书云：

缺分虽迥不如从前，然吾以菲衣节食处之，京寓菽水之资尚可筹措。

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致翁曾翰家书云：

至京中债务，只好渐渐清理，惟寓中菽水之资，则时刻在念，遇便当即寄京也。

仅同治四年，翁同爵“寄京前后共五千貳百金”^②，乃是其撙衣节食而来。

2. 兄友弟恭，兄弟之情真。

从同治三年十月，翁同爵出京赴任，直至光绪三年八月病逝，十年间，翁同爵与翁同龢聚少离多。其间，有两次回籍葬亲。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六日，翁心存病逝。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七日，翁同爵兄长翁同书病卒花马池公寓。同治七年七月下旬至十一月下旬，翁同龢请假三个月，第一次回籍葬亲^③。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翁心存夫人许氏病逝。同治十一年三月，翁同爵因母丧抵京，继而于四月二十一日，翁同爵与翁同龢兄弟二人挈家人第二次回籍葬亲，六月下旬抵达常熟家中^④。同治十三年六月返京；九月初八日，奉旨补授湖北巡抚；十月二十三日，翁同爵起程赴任。

^① 参见同治五年八月二十日致翁曾翰家书。

^② 参见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日致翁曾翰家书。

^③ 《翁同龢日记》第二卷，第 656—657 页。

^④ 《翁同龢日记》第二卷，第 940—963 页。

6 翁同爵家书系年考

除此两段时间之外，翁同爵离京外任期间，如在湖南、四川、陕西时，兄弟之间书信往来频繁。据《翁同龢日记》记载，从同治三年十月至光绪三年七月十馀年间，京中翁宅收到翁同爵家书约计一百九十通左右，兄弟二人通信差不多平均每月一次。如果加上遗失的信件，或至少有二百通以上。其中，同治四年，翁同龢收到翁同爵信函二十馀通，三万馀字。其他时间，如同治五年、六年、八年等亦有二十通左右。

翁同爵致翁同龢家书中的絮絮叨叨，展现了翁同爵对翁同龢的关怀备至，俨如父母般琐碎的关爱，从翁同龢的朝中差事、为人处世，至其衣食住行、待人接物，事无巨细，件件挂心。如同治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致翁同龢书云：

吾弟总校事烦，三冬天气严寒，宜间日一往，勿太劳顿。夷务本末可以携回家中纂辑，似稍安逸。

同治四年八月致翁曾翰书云：

汝叔官翰林，似不宜有所建白，可劝其不必激昂慷慨。盖职分所在，非同言官，毋庸论列时事也。至嘱，至嘱。

同治五年正月十六日书云：

待人须谦恭，处事须和平，礼节须谨慎，言语须缄默。盖其地贵近日，与枢廷及御前诸贵人相周旋，凡一举一动不可忽略。侍从宦官，亦宜待以礼貌。至年节所费，更不可少。吾弟素性近于亢厉，须时时自持之，切勿太过为嘱。

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致翁同龢书云：

吾弟素性抗直，喜议论。然职非言官，切勿有出位之思也。

同治五年正月初六日致翁同龢家书云：

吾弟平素衣服本不讲究，虽是俭德，然既当此差，则不能不添制数件。凡棉夹、单纱、袍褂，皆须齐全。单纱者必须要新旧两副。（旧者备阴雨天穿。）蟒袍青褂等单纱者，亦不可无。袍子大小长短要称身。在御前讲书，袍须略短，起跪方便。

翁同龢寓居城外，翁同爵觉得翁同龢内廷当差，“须寅入申出”，所以“城内必须觅一栖止之所，方可少节劳顿。否则，每日皆由城外起身，往返多走三刻，未免太劳。若遇暑雨祁寒，更添辛苦”，并再三嘱咐“切不可惜此小费”而因循不办^①。如同治四年二月初八日致翁同龢家书云：

寓居在城外，一切不便。可于城内暂觅一栖止之所。否则，盛暑祁寒均非所宜，切勿吝此小费为嘱。

同治五年二月初九日家书云：

吾弟日侍圣学，诸宜谨慎，惟寅入申出，未免劳顿。若仍由南横寓进内，则往返皆须多走四刻，更觉辛苦。故城内小寓不能不觅，否则盛暑祁寒，殊形不便。兄前书已详及，幸采纳之，勿惜费也。

同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致翁同龢书云：

^① 参见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致翁同龢书。